

陸游晚年以「疾病」隱喻之和戰思想

黃奕珍*

摘要

陸游的愛國詩篇向來備受關注，一般皆視其為永不肯言降的強硬主戰派。然而其晚年一系列以疾病隱喻政治思想的詩篇，卻透露出不同的訊息。本文借助隱喻的基本例則，分析陸游以治國說明治疾的原因，並與其愛國詩作及當時的政治情勢作密切的對照與稽疑，抉發其對開禧議和的態度之轉變。他由最初的重視養生、謹慎作息而逐漸發展出以元氣為本、戒慎藥石，進而視病如嚴師畏友與以慈愛之心加以包容的獨特主張。這些也在在隱喻了歷經曲折的戰和過程後，詩人經過深入的省思，所婉轉表達的對待金人的正確態度、接受和談的意願，並賦予此一處境積極正面的意義，以及用仁愛寬和的心胸處置戰後或聚而為盜的忠義人的原則。

關鍵詞：陸游、愛國詩、疾病隱喻、開禧北伐、嘉定和議

* 國立臺灣大學中國文學系教授。

On Lu You's Thoughts of War and Peace Implied in the Metaphors of Illness Written During Old Age

Huang Yi-Jen
Professor, Department of Chinese Literature,
National Taiwan University

Abstract

The patriotic poems of Lu You have been paid close attention to, with emphasis that these poems represent the faction that advocates war and refuses to surrender. Yet, from the poems written during his old age which use the metaphors of illness to convey Lu You's political views, we can find a quite different attitude toward the attack launched during the Kai-shi period. The turbulent situation during this time made Lu You reconsider the benefit of peace. In these poems, he expresses the willingness of making peace and explains its positive aspect through examples of healing from illness. He also proposes to use humanistic and magnanimous airs of manner to treat the gallant outlaws who were displaced after war.

Keywords: Lu You, the patriotic poems, the metaphor of illness, The Attack upon the Chin in Kai-shi period, The Treaty of Peace made in Chia-ting period

陸游晚年以「疾病」隱喻之和戰思想

黃奕珍

一、前言

陸游的愛國詩篇數量龐大，為歷來詩人、評論家所關注，研究成果亦極豐碩，不過一般僅注意其氣勢奔放、直抒胸臆的作品，而其透過較隱晦的方式、巧妙的修辭表達的思想卻未獲得相對的重視。

本人在閱讀陸游相關詩作時，觀察到他有以治病隱喻治國或禦戎的傾向¹，在約十首左右的詩篇中側重或有所不同，但目的在表述其對宋金關係之看法，故總稱為和戰思想。這些藉著隱喻表達的論點可謂大膽新穎，多有迥異於其愛國詩作者。且其作品集中於其生命的最後幾年，與寧宗朝開禧北伐事依託密切，因此嘗試以隱喻的基本例則加以深入分析，期望能提供另一角度詮釋陸游的愛國思想。

本文所謂的「隱喻」(metaphor)乃廣義的用法，包含了修辭學著作的明喻、隱喻與其他具有譬喻性質的形式，其形式即為「甲比乙」，或可理解為「A=B, B=C, 故 A=C。」故其成立的形式要件是：

- 第一・必須有不同的二個對象，A 與 C；第二・A 與 C 必須有 B 使之相牽連；
- 第三・這個 B 必須是 AC 共有的某種價值。²

傳統上將「隱喻」視為修辭辭格，僅停留於字與詞的等級，但是現代的研究已將其

¹ 本文雖亦詮析陸游此類隱喻的疾病觀，但目的為勾連其與愛國、政治思想與和戰態度的關係，與藉疾病反省文化中普遍的偏見，如〔美〕蘇珊·桑塔格(Susan Sontag)著，程巍譯：《疾病的隱喻》(上海：上海譯文出版社，2003)。或具體針對某時代、某地區、某類疾病等作歷史考察的研究，如林富士：《疾病的歷史》(臺北：聯經出版社，2011)有所區隔。

² 王夢鷗：《文學概論》(臺北：藝文印書館，1982)，第十四章〈譬喻的基本型〉，頁 141-143。

作為認識世界的基本工具³，而將其提升至句子與話語的層次⁴，所以我們可以將其更細緻地定義為「隱喻是在彼類事物的暗示之下感知、體驗、想像、理解、談論此類事物的心理行為、語言行為和文化行為」⁵，本文亦非在字、詞或句子的層次上處理隱喻，而是將陸游以疾病隱喻政治思想的詩作視為一個論述系統，並嘗試廣泛地探究其內存的意義。

陸游的這些詩作題目皆不離「疾病」，一般人會以為論治疾才是詩人關注的焦點，然而若對「隱喻」之深具認知意義有所了解的話⁶，便知道其連繫兩類事物進而創造新知識、建構新概念的功能，也更能夠接受隱喻另一端的特殊價值，因為「隱喻中的喻體對說話者或聽話者來說要比本體更為熟悉。」⁷這和傳統的「辟也者，舉也（他）物而以明之也」⁸的說法實有異曲同工之妙，都說明了對陸游來說，隱喻另一端的政治與愛國思想是他較為熟悉的部分⁹，所以他藉此解釋新近思考疾病之所得。

本文將依前述之基本律則，先處理隱喻一端之「疾病」論述，詳密分析其間的變化，再配合當時政治軍事形勢扣緊其與「治國、禦戎」等政治思想所共有的某種類似性或價值，並由愛國作品與疾病論述兩條路線觀察與辨析其言說之曲折細膩處，進而闡釋其深蘊的涵義，以見出陸游創作此類隱喻的深衷。

³ 「將譬喻視為人類理解的精華、創造新一層意義與生活新真實的機制」，〔美〕雷可夫（George Lakoff）、詹森（Mark Johnson）著，周世箴譯注：《我們賴以生存的譬喻》（臺北：聯經出版社，2006），頁 292。

⁴ 見 Ricoeur, Paul. *The Rule of Metaphor* (London: Routledge & Kegan Paul, 1978).

⁵ 季廣茂：《隱喻視野中的詩性傳統》（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1998），頁 14。

⁶ 束定芳論及隱喻的認知功能是「人類組織概念系統的基礎、作為人類組織經驗的工具、認識事物的新視角與類說推理。」見氏著：《隱喻學研究》（上海：上海外語教育出版社，2003），第五章第四節標目、目錄頁 4。

⁷ 束定芳：《隱喻學研究》，頁 17。

⁸ 此語出自《墨子·小取》，參戰國·墨翟著，李漁叔註譯：《墨子今註今譯》（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74），頁 317。劉向《說苑·善說》亦云：「惠子曰：『夫說者固以其所知，論其所不知，而使人知之。』」參漢·劉向：《說苑》，收入百部叢書集成成本第 147 冊（臺北：藝文印書館，1965），頁 102。

⁹ 陸游約自 41 歲起便不乏描寫病況、書寫病中心情的詩篇，但其中具哲學性思考者並不多見，而隱喻其政治思想者率皆為此類。

二、「疾病」隱喻之內涵

陸游對「疾病」、「養生」提出了相當豐富的看法，其中把「治病」與「治國」、「抵禦異族」以精緻的譬喻連繫起來的亦復不少。不管是內政或外交的問題皆可包含於內，因為國家出了差錯就如同身體失去了健康。

我們知道讓隱喻的兩端產生關係最重要的是二者的類似性，雖然放翁詩作中這類隱喻出現的時間相當遲晚，但《老學庵筆記》有一條記載他在蜀中得見上官道人事已把治國與養生間的相似點清楚地勾勒出來：

青城山上官道人，北人也，巢居，食松麩，年九十矣。人有謁之者，但粲然一笑耳。有所請問，則托言病聵，一語不肯答。予嘗見之於丈人觀道院。忽自語養生曰：「為國家致太平，與長生不死，皆非常人所能。然且當守國使不亂，以待奇才之出，衛生使不夭，以須異人之至。不亂不夭，皆不待異術，惟謹而已。」予大喜，從而叩之，則已復言聵矣。¹⁰

老人認為要國家太平、壽命不夭惟在「謹」而已的看法在陸游之後的相關詩篇中亦能屢次見到。

以下基本上將依年代先後檢視其重要的相關論述。¹¹

宋光宗紹熙 5 年（1194）秋寫於山陰的〈秋雨歎〉從擔心秋雨之將浸瀾稻梁入題，進而點出自己濃重的憂國之思，篇末云：「疽囊雖慘固可醫，誰為聖代施鍼石」¹²，他所謂的「疽囊」除了指前二句的盜賊之外，尚應包含以北方之金人為主的的外患。¹³由宋高宗（1127-1162）、孝宗（1163-1189）直到光宗（1190-1194）近七十年，陸游

¹⁰ 宋·陸游：《入蜀記·老學庵筆記》（上海：上海遠東出版社，1996），卷 1，頁 145-146。

¹¹ 寫作時間一依錢仲聯氏之繫年。參宋·陸游著，錢仲聯校注：《劍南詩稿校注》（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5）。

¹² 宋·陸游著，錢仲聯校注：《劍南詩稿校注》，頁 2045。全詩為「淙淙雨聲瀉高秋，稻梁浸瀾雨不休。志士仁人萬行淚，孤臣孽子無窮憂。一身窮困未暇恤，如此無事理有不？聖言古訓舉不驗，簡編可用汗馬牛？嗚呼有粟吾得食，夜睡何時得安席？我生猶及宣和年，建炎以來身所歷。高皇一言感天地，盜賊千群掃無跡。疽囊雖慘固可醫，誰為聖代施鍼石！」

¹³ 「我生猶及宣和年，建炎以來身所歷」除了說明中原由無事到有事外，還包括了靖康之禍與南宋初年歷經的兇險情勢。

顯然認為南宋的病況不輕，而且還找不到可施藥石予以治癒之仁人志士。「疽囊」一句是用來比喻南宋朝廷的狀況，一般人染患嚴重的毒瘡都可以醫治，但南宋卻尚未找到醫者以進行有效的治療。

寫於寧宗慶元 3 年春（1197）的〈病中作〉二首之二思致曲折，他把養生治病與治民致太平等同論之：

牧羊知治民，解牛得養生，一理儻造微，何事不可明。我老抱病久，頗窺古人情。唐堯授四時，帝道所以成。周家七百年，王業本農耕，造端無甚奇，至今稱太平。人生正如此，默默要無營；心君但高拱，萬物安能撓！¹⁴

唐堯與周朝之所以能成帝道王業，主要在於順應四時、著力於農耕，陸游以為確立宗旨、心無旁騖地踏實作去，自然能夠獲得全面的成功。至於治病，也在持養心靈，以安靜無營的態度消弭疾患。

寫於寧宗慶元 6 年（1200）的〈居室記〉有兩個養生治病的要點頗堪注意：「歲暮必易腐瓦，補罅隙，以避霜露之氣。朝晡食飲，豐約惟其力，少飽則止，不必盡器；休息取調節氣血，不必成寐；讀書取暢適性靈，不必終卷。衣加損，視氣候，或一日屢變。行不過數十步，意倦則止。雖有所期處，亦不復問。」¹⁵這和在此前後所云注意日常生活、起居飲食而求謹慎自珍是一致的。另外，他又提到「有疾，亦不汲汲於藥石，久多自平。家世無年，自曾大父以降，三世皆不越一甲子，今獨幸及七十有六，耳目手足未廢，可謂過其分矣。」¹⁶以此證明不必力求藥石之效，亦可視為嘉定元年（1208）之後多方反省藥物、針砭及手術等醫療行為的前驅。

〈養生〉一詩寫於寧宗開禧元年（1205）秋季：

衰病猶弱國，地與齊楚鄰，朝憂羽書來，暮畏戎車塵，奔命不敢辭，所懼殘吾民。羸老正類此，日夜憂其身，起居食飲間，恐懼自貴珍，一念少放逸，

¹⁴ 宋·陸游著，錢仲聯校注：《劍南詩稿校注》，頁 2305。

¹⁵ 曾棗莊、劉琳主編：《全宋文》冊 223（上海：上海辭書出版社、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2006），頁 118。

¹⁶ 曾棗莊、劉琳主編：《全宋文》冊 223，頁 118。

禍敗生逡巡。所以古達者，訓戒常諄諄。不死正爾得，成真非有神。¹⁷

用來比喻衰病狀況的國家處境被描繪得既生動又細膩：鄰近如齊、楚般的強國，時時憂慮猝不及防的衝突或戰事。他同時形容自己應對的態度是盡量解決問題，注意生活起居，珍惜自己，不敢有時刻的大意。值得注意的是他提到「所懼殘吾民」，表達了對人民／身體的愛護之心，在憂患之中透顯著慈悲與智慧。而「不死正爾得，成真非有神」既繼承了前引《老學庵筆記》「上官道人」條之「使國不亂、身不夭，惟謹而已」，也顛覆了其「為國家致太平，與長生不死，皆非常人所能。然且當守國使不亂，以待奇才之出，衛生使不夭，以須異人之至」的看法，不再等待奇才、異人，而以「謹慎自珍」達到不死、甚至「成真」的境地，可以說是大幅提高了「謹慎自珍」的效能與位階。

〈小疾偶書〉寫成於寧宗開禧2年（1206）秋季：

書生本願致時康，自怪秋來疾在床。胸次豈無醫國策，囊中幸有活人方。但知元氣為根本，正使長生亦秣隸。豎子何勞一除掃，區區猶欲恃膏肓。¹⁸

這首詩似乎處處著眼於疾病，其實處處不離治國。首先，他描述了一個令自己感到詫異的處境：這個書生不是要為國致太平的嗎？怎麼先病倒在床了呢？無法「致時康」和「生病」巧妙地連結在一起，而次聯又把「醫國策」與「活人方」對舉，不僅再次突顯了前述的鏈結，還呈現了二者關係之另一面：他有治病之方，也有把握療癒自己的病痛，但是卻苦無機會療癒國家。之後，他更提出「元氣為根本」的主張，並以誇張的語氣、輕蔑的態度嘲笑疾病之自以為是、不自量力。而這個主張又超前了「上官道人」條「長生須待異人」與〈養生〉中以「謹慎自珍達致不死、成真」的論述，將「元氣」之充沛視為絕高之準則，以致連長生之想皆可視如無物。

而寫於宋寧宗嘉定元年（1208）春的〈病中有述二首各五韻〉則更深刻全面地探討了治病之理：

萬事有常理，中智皆能知。禍福如白黑，不待諏蓍龜。疾患初萌芽，未有旦

¹⁷ 宋·陸游著，錢仲聯校注：《劍南詩稿校注》，頁3559。

¹⁸ 宋·陸游著，錢仲聯校注：《劍南詩稿校注》，頁3828。

夕危。每能自省察，百鬼安能窺？一怠生百疾，速死乃自詒。(之一)

為國恃久安，變起最莫測。釋楚為外懼，此實計之得。吾儕學養生，事事當自克。老無聲色娛，戒懼在飲食。要須銘盤盂，下箸如對敵。(之二)¹⁹

前一首集中討論治疾須不懈於自省，故能根治於初發之時；後一首則將此理推之於日常生活之中，並以治國為例以作引申。「釋楚」一句語出《左傳》，成公 16 年：

文子曰：「吾先君之亟戰也有故。秦、狄、齊、楚皆彊，不盡力，子孫將弱。今三彊服矣，敵，楚而已。唯聖人能外內無患；自非聖人，外寧必有內憂。盍釋楚以為外懼乎？」²⁰

細味此詩，陸游強調的是人之有疾患並不可怕，怕的是不夠警覺、不肯自制，因此若以國家為例，心理上不宜倚恃長久之安定，以免變起倉促、無法因應。依此理路，留得一強敵時時警戒人心，也是不錯的國策。之後談養生，要戒飲食聲色等亦皆集中於自我存養，以鞏固本身之元氣為主，和前述不求盡弭外患正可符應。這兩個論點在〈養生〉詩中已然提過，只是那時前項論點著重於描寫國家處境之危險與可憂，並未將其背後之思維和盤托出。

寫於同年夏季的〈病戒〉延續強調省察、謹慎作息的思路，並把「身」與「國」、「病」與「亂」等同起來，故「憂身畏病」即如「憂國畏亂」，雖然全詩偏重於在養生上立說，但基於譬喻的兩端彼此說明的基本例則，其實也在說治國之道。

憂身如憂國，畏病如畏亂；此身雖幸健，敢作無事看？禍福在呼吸，恐懼兼寢飯。人所忽不省，我思嘗熟爛。夜臥不安席，晨起寧待旦？雖云親藥石，得失每參半。人情喜一快，往往觸剝悍。收功寧使遲，覆敗不可玩。²¹

從「雖云」一句起，陸游加入了以藥石治病的部分，他以為用藥有利有弊，尤其常人喜歡見效甚速的藥物，卻不知往往也可能因此加重病情，甚或死亡。對此做過深刻思考的詩人遂提出「收功寧使遲，覆敗不可玩」的結論。如果治病如此，那麼治國亦相彷彿：要平定禍亂，還是得小心謹慎，不應冒然從事，以免傷及國本，終至

¹⁹ 宋·陸游著，錢仲聯校注：《劍南詩稿校注》，頁 4131-4132。

²⁰ 西晉·杜預注，唐·孔穎達疏：《十三經注疏·左傳》第 6 冊（臺北：藝文印書館，1983），頁 474。

²¹ 宋·陸游著，錢仲聯校注：《劍南詩稿校注》，頁 4197。

覆亡；也就是若無萬全準備，仍以不妄動為上策。另外，由詩中形容烈猛之藥為「剽悍」²²，稱病人之死亡為「覆敗」，皆可看出其作雙重指涉之意甚為明顯。而全詩的「憂懼」程度也較之前諸詩濃重許多。

嘉定元年（1208）韓侂胄伐金失利後，宋廷依金朝要求以韓之首級贖淮南地，開禧北伐遂正式以失敗告終。寫於此年冬日的〈小疾治藥偶書〉二首之一開頭即提及此事，而且還拈出「無事」、「無為」以為箴言：

禦戎虛上策，治疾闕全功。安得如神禹，常行無事中？（之一）

揠苗農害稼，過劑藥傷人。此理君能造，無為萬物春。（之二）²³

抵禦北戎固為不變的方向，但若未有高明的對策，就好像沒把疾病根治一般。舉大禹治水、揠苗助長、過劑傷人為例，說明了不衝動行事、不擾動百姓等看似消極無為的作法，其實才是至理，也間接批判了韓氏所主導的北伐。²⁴那麼，無為、無事就能把疾患治好嗎？在這二首詩中，並未明確表達其答案，不過，無為無事至少勝過魯莽行事，也許，「萬物春」就是暗指其結局是充滿希望的。此詩與〈病中作〉二首之二的「心君高拱、默默無營」亦有暗合之處。

〈病戒〉與這首詩同樣地表現了陸游對藥物的戒慎之心，他注意到使用藥物不全是有益無害的，認為此舉往往「得失參半」，又再度提醒須極留意其劑量多寡之拿捏，在在可看出他對以藥治病的深刻省思。

寫於嘉定2年春（1209）的〈病起雜言〉對外患／國家與疾病／健康的關係作了更為細密精闢的闡述：

國不可以無菑眚，身不可以無疾疾。無菑之國亂或更速，無疾之身死或無日。
昆夷獫狁無害於周之王，鬪土富國無救于隋之亡。壯夫一臥多不起，速死未必皆羸尪。古來惡疾棄空谷，往往更得度世方。我年九十理不長，沉復三日

²² 錢注引《重修政和證類本草》卷1以釋此句云：「下品藥性，專主攻擊，毒烈之藥，傾損中和。」參宋·陸游著，錢仲聯校注：《劍南詩稿校注》，頁4197。

²³ 宋·陸游著，錢仲聯校注：《劍南詩稿校注》，頁4338。

²⁴ 陸游引《孟子·離婁下》「禹之行水也，行其所無事也。如智者亦行其所無事，則智亦大矣。」之語，表露了他對韓氏北伐一事的看法，即其既缺乏上策，亦非智者之所為。引文見東漢·趙岐注，北宋·孫奭疏：《十三經注疏·孟子》第8冊（臺北：藝文印書館，1983），頁152。

病在床，天公念之亦已至，儆戒不使須臾忘。起居飲食每自省，常若嚴師畏友在我傍。躋民仁壽則非職，且為老僊鍼膏肓。²⁵

在此之前疾病 / 外敵的用處是作為警惕以確保身體與國家的健全，但是卻未推進至不可或缺的程度，可是這首詩把疾疾與蓄眚視為維持安康所必備之物。就「國家」而言，他舉「昆夷殲狁」等外患之存在不妨害周朝之稱王，又以隋之不苦於外族侵擾但仍快速覆亡兩個正反例證來闡明此理；就人身而言，則以壯夫與惡疾者分開述說。尤其是「古來惡疾棄空谷，往往更得度世方」之含意又將一般以為不好、不祥的事物視為更具建設性的轉機，如此，則疾病之於人、外患之於國，也就不僅為全然的煩惱與痛苦，而是維繫其健全存在與激勵其邁向更為美好境界的必需品了。此詩之後再以其自身情形為例，重申嚴於自省之意，把不離其身的「疾病」比成管教嚴格的老師與品德端重令人敬畏的朋友，認為他們有助於醫治自己幾近無藥可救之衰老與疲憊。至此，「疾病」的形象有了相當程度的轉變，原來代表著危險、隨時準備侵襲人身、殘害軀體，又狂妄自大、猶如百鬼的疾病，現在竟是為著我們的終極利益而努力的嚴師益友了。

同年秋日所寫的〈疾小愈縱筆作短章〉頗有總結其以疾病隱喻國之禍亂之態勢：

治疾如治盜，要使復其常；藉曰用戈矛，全之寧欲傷？彼盜皆吾民，初非若胡羌；奈何一朝忿，直欲事歐攘？歐攘雖快心，少忍理則長。華陀古神醫，煎澆到肺腸，取效雖卓犖，去死真毫芒。君審欲除盜，惟當法龔黃，撫摩倘有道，四境皆耕桑。我亦以治疾，不減玉函方。²⁶

與前引諸詩不同的是首次提出「復常」的觀念，雖然這個意思在〈小疾治藥偶書〉之強調「無為」、「無事」時亦可包入，但卻未被明確拈出。用武力弭平盜亂，勢必多所傷害，所以，主張要以仁愛之心「少忍」，並且仿效龔遂、黃霸撫育人民、勸勵農桑之法，這樣才能夠使人民的生活回復常軌，並進而徹底消除盜賊。而陸游也不忘以華陀為例，認為使用藥物取效雖宏，風險亦高，和〈病戒〉一詩所云之「雖云親藥石，得失每參半。人情喜一快，往往觸剽悍」異曲同工。使用平寧溫和的手段，

²⁵ 宋·陸游著，錢仲聯校注：《劍南詩稿校注》，頁 4436。

²⁶ 宋·陸游著，錢仲聯校注：《劍南詩稿校注》，頁 4483。

出之以仁愛容忍之心，不貪速效、不求快意，不僅能夠治盜，也是詩人用以治疾之道。而以「愛心」治民治身的論點，在寫於四年前的〈養生〉也已約略提到：「奔命不敢辭，所懼殘吾民」，但並未加以申論，也未舉龔遂、黃霸等為例，因此不能完整見出其出之以撫育教養人民的仁厚之心的論點。

另外值得注意的是，這首詩區別了盜賊與胡羌，之前的詩篇基本上以疾病對應的是如楚國般具威脅性的鄰國、戎狄，是較為籠統的禍亂，但此處卻把盜匪歸入宋朝之人民，以與「胡羌」區辨開來。這可能是因為此詩將治病 / 治盜的哲學思考推到了一個新的層次，以一片溫厚之心包蘊黎民，對時刻不忘北伐復國、永記金虜殘暴之行的陸游而言²⁷，要將之推及於金人胡羌，實非易事。

歸納陸游以疾病隱喻國家情形的內涵，大致有幾個重點：

- (一) 強調戒慎、克制、不怠的重要，認為應用得法可消弭疾病於無形。
- (二) 將疾病視為警惕自我的工具，並推論至為維持健康所不可或缺者。
- (三) 討論藥石之效，認為要恰當拿捏分量，以免對健康造成不可挽回的傷害，其中特為強調手術的風險。
- (四) 主張護持元氣，並突顯「無事」、「無為」的效用。
- (五) 提出「復常」的理論，嘗試以平和寬容、仁慈愛顧的心態對待身體。

三、此一時期之愛國論述

因為隱喻的表義方式是由其兩端互相支撐、說明、詮釋的，所以以下將分別詮析陸游的愛國論述與以疾病隱喻治國的詩作，並互為對照，以抉發詩人隱藏其中的另一種聲音。

茲先將此類隱喻之寫作時間列表如下：

²⁷ 陸游視金人為蕩覆中原的元凶、欺壓遺民的惡棍與當受誅戮的小醜，認為他們的性情如動物般殘暴狡猾，是可恨的魔鬼。見筆者：〈試論陸游筆下的異族形象〉，收入鄭毓瑜主編：《文學典範的建立與轉化》（臺北：臺灣學生書局，2011），頁 259-296。

年歲	年號	西元	首數	詩題
70	宋光宗 紹熙 5 年	1194	1	〈秋雨歎〉
73	宋寧宗 慶元 3 年	1197	1	* 〈病中作〉二首之二
81	開禧元年	1205	1	* 〈養生〉
82	開禧 2 年	1206	1	* 〈小疾偶書〉
83	開禧 3 年	1207	0	
84	嘉定元年	1208	3 題 4 首	* 〈病中有述二首各五韻〉
				* 〈病戒〉
				* 〈小疾治藥偶書〉
85	嘉定 2 年	1209	3	* 〈病起雜言〉
				* 〈疾小愈縱筆作短章〉
				〈一病七十日〉

打*者為整首皆為隱喻者

若由愛國詩的脈絡來觀察陸游在這幾年的相關作品，我們約略可以看到自宋寧宗嘉泰 4 年正月（1204）韓侂胄定議伐金後²⁸，放翁的詩篇大體洋溢著熱烈的情感、豪放的氣概，對戰況有著相當即時的反映，並不斷重申復國的壯志。

如寫於此年的〈送辛幼安殿撰造朝〉鼓勵辛棄疾能為國效力，消滅逆胡：「天山挂旆或少須，先挽銀河洗嵩華。中原麟鳳爭自奮，殘虜犬羊何足嚇。」²⁹〈書事四首〉則以想像之情景激勵準備伐金的宋廷：「聞道輿圖次第還」、「鴨綠桑乾盡漢天，傳烽自合過祁連」。³⁰開禧元年（1205）的作品如〈出塞四首借用秦少游韻〉語調更為豪放，頗能表現他激動的心情：「北伐下遼碣，西征取伊涼。壯士凱歌歸，豈復賦國殤。連頸俘女真，貸死遣牧羊。犬豕何足讎，汝自承餘殃。」（之一）³¹

次年的〈二月一日夜夢〉對北伐也懷抱著相當的信心：「勝算觀天定，精忠壓虜

²⁸ 明·陳邦瞻：《宋史記事本末》（臺北：三民書局，1973），卷 83，頁 236，「北伐更盟」條。

²⁹ 宋·陸游著，錢仲聯校注：《劍南詩稿校注》，頁 3314-3315。

³⁰ 宋·陸游著，錢仲聯校注：《劍南詩稿校注》，頁 3369-3371。

³¹ 宋·陸游著，錢仲聯校注：《劍南詩稿校注》，頁 3527-3529。另之二、之四亦如此：「煌煌藝祖業，土宇盡九州，當時王會圖，豈數汝黃頭。今茲縛蠹下，狀若殼棘牛。萬里獻太社，裨將皆通侯。」、「小醜盜中原，異事古未有。爾來閭左起，似是天假手。頭顱滿沙場，餘骸飼豬狗。天網本不疎，貸汝亦已久。」

和」³²，開禧 2 年（1206）5 月韓侂胄請下詔伐金，初期的勝利使陸游既欣慰又失落：「卻看長劍空三歎，上蔡臨淮奏捷頻」³³，對收復失地他感到無比的興奮：「日聞淮潁歸王化，要使新民識太平」³⁴，他讚歎軍紀的嚴整、將帥的撫愛士卒：「方今詔書下，淮汴方出師，黃旗立轅門，羽檄晝夜馳，大將先擐甲，三軍隨指揮。行伍未盡食，大將不言飢；渴不先飲水，驟不先告疲。」³⁵〈感中原舊事戲作〉³⁶說盡他內心的欣喜，他認為胡人國運衰微，預測宋軍即將得到勝利。³⁷〈聞西師復華州〉³⁸表現了他對戰事進程的關心與掌握。

此年年底，吳曦降金，對北伐大業是一記沈重的打擊，但他仍在寫於次年春天的〈春晚即事〉四首之三提醒大家金兵並不足懼：「殘虜遊魂苗渴雨」³⁹，並在〈書感〉一詩中支持必須面對已經動搖的宋室君臣的韓侂胄：「一是端能服萬人，施行自足掃胡塵。南州不可無高士，東國何妨有逐臣。」⁴⁰

及至宋朝軍隊受到吳曦叛降、金兵渡淮的挫折，陸游仍然期待著凱旋的一天：「老民願忍須臾死，傳檄方聞下百城」⁴¹。之後，吳曦被誅，蜀地已平，他認為此事將對北虜心理造成重大衝擊：「頭顱之行萬里，已大震於戎心。遙知群醜宵遁之餘，無復並塞秋防之警。」⁴²期盼北伐能繼續進行⁴³；他在議和氣氛濃重的夏季寫出內心的

32 宋·陸游著，錢仲聯校注：《劍南詩稿校注》，頁 3699。

33 宋·陸游著，錢仲聯校注：《劍南詩稿校注》，頁 3763，〈觀邸報感懷〉。

34 宋·陸游著，錢仲聯校注：《劍南詩稿校注》，頁 3774，〈賽神〉。

35 宋·陸游著，錢仲聯校注：《劍南詩稿校注》，頁 3777-3778，〈劇暑〉。

36 「蜂兒園裏香塵細，燕子樓中寶瑟斜。惟有天知太平事，乞傾東海洗胡沙。」參宋·陸游著，錢仲聯校注：《劍南詩稿校注》，頁 3784。

37 〈老馬行〉：「中原蝗旱胡運衰，王師北伐方傳詔。」〈親舊見過多見賀強健戲作此篇〉：「它年不死君須記，會在天津看落暉。」各見宋·陸游著，錢仲聯校注：《劍南詩稿校注》，頁 3818、3794。

38 宋·陸游著，錢仲聯校注：《劍南詩稿校注》，頁 3852。

39 宋·陸游著，錢仲聯校注：《劍南詩稿校注》，頁 3920。案，本年 11 月金兵渡淮，宋師各路失利，金主即令布薩揆大張渡江聲勢以備宋，為逼和之計。相關記載可參閱明·陳邦瞻：《宋史記事本末》，頁 239。

40 宋·陸游著，錢仲聯校注：《劍南詩稿校注》，頁 3921。

41 宋·陸游著，錢仲聯校注：《劍南詩稿校注》，頁 3937，〈五月二十一日風雨大作〉。此詩末自注「蜀盜已平，淮壩胡賊亦逝去」。

42 他的文集內亦收有三篇祝賀平定吳曦之文：〈逆曦授首稱賀表〉、〈逆曦授首賀皇后箋〉、〈逆曦授首賀太皇太后箋〉，此引自〈逆曦授首稱賀表〉，參曾棗莊、劉琳主編：《全宋文》冊 222，頁 182、186、

擔憂：「淮浦戎初遁，興州盜甫平。為邦要持重，恐復議消兵。」⁴⁴秋日所寫的〈霜風〉特別標舉寧宗「和議未可就」之詔，並以封賞有功之將領表達其期望戰事順利進行的心願：「關吏雖通西域貢，王師猶護北平秋。黃旗馳奏有三捷，金印酬功多列侯。」⁴⁵

總之，本年陸游對時局之總體看法為「對金用兵，首先應慎擇將帥，剔除動搖份子、投降派；在戰鬥過程中如遇不利、挫敗，亦不應為金人虛張聲勢之表面威風所懾服；復望文武臣僚勿為個人計而應具『長路諳冰霜』之毅力與夫『超遙萬里程』之氣魄。此外，對朝廷屈從金人意旨殺死韓侂胄表示悲惋；最後仍顯示與金人鬥爭到底之決心，在失敗、艱危中毫不動搖……。」⁴⁶

可是到開禧3年（1207）11月，韓侂胄為主和派之史彌遠等狙殺，宋廷已無再戰之志，而且和議也在積極進行中，次年（1208）3月朝廷恢復秦檜王爵贈諡，又派王柝至金，請依靖康故事，世為伯姪之國；增歲幣為三十萬，犒軍錢三百萬貫；俟和議定後當函蘇師旦等首以獻。之後金朝移書索韓侂胄首以贖淮南地，改犒軍錢為銀三百萬兩。4月，王柝以韓侂胄、蘇師旦首至金；5月，金獻二人首於太廟社稷；6月，金遣使來歸大散關及濠州。此後陸游的作品充斥著焦慮、憤恨、憂心，也一再重申為國效力之願望：如「正如疾逆虜，憤切常橫膺。蹭蹬忽衰老，何由效先登？」、「虜驕為國私憂」、「退士憤驕虜」⁴⁷；「孤臣報國嗟無地，只有東皋更飽犁」、「許國寸心孤劍知」。⁴⁸寫於85歲夏季的〈即事〉頗有總結性意味：

185。

⁴³ 〈聞蜀盜已平獻馘廟社喜而有述〉：「北伐西征盡聖謨，天聲萬里慰來蘇。橫戈已見吞封豕，徒手何難取短狐。學士誰陳平蔡雅？將軍方上取燕圖。老生自憫歸耕久，無地能捐六尺軀！」參宋·陸游著，錢仲聯校注：《劍南詩稿校注》，頁3952。

⁴⁴ 宋·陸游著，錢仲聯校注：《劍南詩稿校注》，頁3953，〈雨晴〉。

⁴⁵ 宋·陸游著，錢仲聯校注：《劍南詩稿校注》，頁3965。錢仲聯引《建炎以來朝野雜記》乙集卷18之語注「北平秋」一句：「（開禧3年）9月4日丁丑，詔以和議未可就，令諸大帥申警邊備。」

⁴⁶ 于北山：《陸游年譜》（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5），頁536。為求簡要，不錄作品名。

⁴⁷ 以上所引為〈予好把酒常以小戶為苦戲述〉、〈感事六言八首之四〉、〈自貽四首之四〉，參宋·陸游著，錢仲聯校注：《劍南詩稿校注》，頁4121、4163、4183。

⁴⁸ 以上所引為〈夏夜納涼〉、〈寓歎二首之二〉，參宋·陸游著，錢仲聯校注：《劍南詩稿校注》，頁4198、4220。

萬里山河拱至尊，羽林鐵騎若雲屯。羣公先正不復作，故國世臣誰尚存！河洛可令終左衽，芻蕘何自達脩門？王師一日臨榆塞，小醜黃頭豈足吞！⁴⁹

他慨歎宋朝有廣大的領地、眾多的軍隊，但不知為何缺少經國之大才，以致無能收復北宋故土，他也為自己的主張無法上達朝廷感到遺憾，最後則重申恢復之志及其可行性。

但與前數年比較起來，放翁愛國詩作在其生命之最後兩年數量大幅減少。而其中有兩首詩與其一貫之思路不甚一致。在絕大多數的作品中，他表現的是南宋之北伐是順應天意的行動，其正當性無可懷疑，而且在可預見的未來一定能夠成功。⁵⁰以下兩首詩各寫成於其 84、85 歲，但卻隱隱透露出對此一主導思想的質疑：

〈幽居記今昔事十首以詩書從宿好林園無俗情為韻十首之七〉

昔戍西陲時，憑高望中原，願欲乘天風，往弔綺與園。有志莫能遂，悵望商山魂。遙想山中人，歲時奠芳蓀，夕陽蕭鼓散，高柳擁廟門。老來更事多，考古見本根，乃知當時事，禍福未易言。千載信悠悠，浩歎掩綠尊。⁵¹

〈讀史二首之一〉

蕭相守關成漢業，穆之一死宋班師。赫連拓跋非難取，天意從來未易知。⁵²

前一首詩的前半描述他於復取中原後遊覽河山、往弔商山四皓的志願。不過，在「老來」以下四句，卻罕見地以四皓扶持惠帝使其太子之位不致廢立的史實加以議論：當時以此為帝國之幸的判斷真的正確嗎？以此類推，是否他之亟欲往弔商山亦有可議之處？甚至以為中原要復歸宋人亦非原先設想的那般正當？詩人綜合己身經驗與「考古」所見之「本根」其實就是「禍福未易言」，而且此理可推而及之他事他物。

後一首詩陸游舉一成一敗之例，說明如若能用像蕭何、劉穆之一類的將相，則

⁴⁹ 宋·陸游著，錢仲聯校注：《劍南詩稿校注》，頁 4411。

⁵⁰ 有關順應天意的論述，請參看筆者〈陸游詩歌中「北伐」之「再現」析論〉一文的第二節第一小節，收入周裕鍇編：《第六屆宋代文學國際研討會論文集》（成都：巴蜀書社，2011），頁 410-429。陸游不僅將北伐視為天意的展現，連南宋政權的建立亦復如斯：「昔在夏禹，會諸侯于會稽。歷三千歲，而我高宗皇帝御龍舟，橫濤江，應天順動，復禹跡。」（《會稽志序》）參曾棗莊、劉琳主編：《全宋文》冊 222，頁 343。

⁵¹ 宋·陸游著，錢仲聯校注：《劍南詩稿校注》，頁 4171。

⁵² 宋·陸游著，錢仲聯校注：《劍南詩稿校注》，頁 4380。

北方異族如金人者可謂唾手可取，但可取而未取的終極原因為何？他也頗為納悶，因此將其歸諸於「天意」，上天的安排遠非人智所能通曉，在此他再也不是那個篤定的號手了。

綜而論之，在此時期陸游的愛國論述大體上維持了一貫的基調，只有在寫於 84、85 歲的兩首詩作透露了對復國一事是否正確的疑慮，也對天意之所歸感到不解。

四、以「疾病」隱喻之和戰思想

由第三節的寫作年表可知陸游以治國隱喻治疾的詩篇集中於 81 歲以後，而以 84、85 歲所占最多，另外，83 歲之空闕亦頗值重視。

70 歲所作之〈秋雨歎〉與 85 歲之〈一病七十日〉雖都有此類隱喻，但其篇幅止於一、二句，重要性遠不如其他諸作。

在南宋朝廷決議伐金前的此類作品只有作於 73 歲的〈病中作二首之二〉，此詩治民與養生比併而論，重點在把握順應四時、勤於農耕的主旨，默默力行，全篇未提及戎狄之患。可是到了寧宗開禧元年秋日所寫的〈養生〉，則著意於弱國之處境，此時韓已決定北伐且開始準備相關事宜，因此其中的「奔命不敢辭，所懼殘吾民」就特別值得商榷，前句正是他在愛國詩中一再明言的態度，後句則可看出他對北伐一事的深層憂慮，詩人不只是激昂的主戰派，他內心裡也明白戰爭對國力的損傷，尤其是平民百姓所受的影響。之後的「恐懼自貴珍，一念少放逸，禍敗生逡巡」亦可視為對正在秣馬厲兵之主政者之箴規。而且，在這首詩中他大幅書寫「謹慎自珍」的功效也可被理解為從事戰備的最高原則。回到此時放翁所寫的愛國詩篇，〈出塞四首借用秦少游韻〉⁵³的奔放狂烈、渴盼功成的急切等與此皆大相逕庭。

82 歲寫的〈小疾偶書〉除了表明他的報國之志外，極為推舉「元氣為根本」，此年 5 月韓侂胄已下令伐金，所以這可能便是他所謂的「醫國策」。而「豎子何勞一

⁵³ 宋·陸游著，錢仲聯校注：《劍南詩稿校注》，頁 3527-3529。

除掃，區區猶欲恃膏肓」的語氣、用字，再再使人聯想到胡虜，他認為若宋廷能夠保存元氣，就不怕自大的金人要脅。可是隨著此年冬季金兵九道南侵、渡淮，吳曦叛降，次年戰爭情勢的好轉及議和的風波，直至 11 月韓侂胄被殺，接近一年多的時間，陸游未再創作此類隱喻。

直到確定依金人條件議和後的嘉定元年春天，詩人才又寫了〈病中有述二首各五韻〉，除了延續之前謹慎自克的論點外，「為國恃久安，變起最莫測。釋楚為外懼，此實計之得」最值得推敲玩味。「為國」兩句可視為對開禧北伐的檢討心得，他雖提倡抗金，可是回頭審視宋廷的條件，的確在隆興和議後過了四十多年「久安」的日子，發動戰爭這樣的大變化本就不易推測其結果，如今能夠大略回到之前的狀況，應該也是可以接受的。「釋楚」兩句的內容，是以前此類隱喻中未曾出現過的，論者因為太過執著於陸游於愛國詩作中陳述的心聲，往往不願承認詩人不僅願意接受宋金共存的現實，甚至把這種現實視為能夠警戒人心、以求長存的正面力量。例如，錢仲聯在此所加之按語為「此乃諷當時投降派之言，非真以為和議乃計之得也」⁵⁴，除了上述原因外，整首詩皆無反諷之脈絡，是以錢氏所言恐非放翁之原意。而且，我們還要注意此語出自《左傳》，其中云：「唯聖人能外內無患；自非聖人，外寧必有內憂」。放翁或以為依南宋當時的條件，要勉強北伐女真，「必有內憂」，所以才接受這樣的情況。再若衡諸此二首詩之內容，陸游也進一步地提到怠於自省使得疾患滋長，也許亦有批評此次戰役之處，最終造成「一怠生百疾，速死乃自詒」的嚴重後果。

寫於本年 5 月的〈吳氏書樓記〉開篇即云：

天下之事，有合于理而可為者，有雖合于理而不可得為之者。士于可為者，不可不力；力不足，則合朋友鄉閭之力而為之；又不足，告于在仕者以卒成之。成矣，又慮其壞，則吾有子，子又有孫，孫又有子，雖數十百世，吾之志猶在也，豈不賢哉！彼不可得為之者，則有命焉，有義焉，不知命義，徒呶呶紛紛，奚益？故君子不為也。然為此者寡也，或易之為彼者輒可以得名

⁵⁴ 宋·陸游著，錢仲聯校注：《劍南詩稿校注》，頁 4132。

于流俗，故士之為此者寡也。⁵⁵

而于北山將此文置於當時的政治語境中作出以下之詮析：

務觀此文，借吳氏兄弟盡力建書樓以推論「天下之事」……以為發憤圖強，抗金雪恥，「雖合于理」，但以目前形勢論，則已「不可得為」矣；「謀謨于朝者」既不能審謀料敵，復不能決心力戰，終又陷於紹興故轍，歲增金幣，乞和苟安，如此，北方廣大領土，何日始得收復！⁵⁶

于氏明確指出陸游對繼續抗金已有「雖合於理但不可為」的認識，這個認識又須借助原文中的「彼不可得為之者，則有命焉，有義焉，不知命義，徒呶呶紛紛，奚益？故君子不為也。然為此者寡也，或易之為彼者輒可以得名于流俗，故士之為此者寡也。」進一步加以探深，放翁應是了解維持原先的主戰路線，的確可以媚俗得名，然而以「命」、以「義」之角度精研覃思之後，他還能夠如此主張嗎？他認為若再「呶呶紛紛」是「君子不為」之事，這也說明了他在這兩年間藉「疾病」隱喻透露出來的政治思想。⁵⁷

同年夏季與冬季的〈病戒〉與〈小疾治藥偶書〉討論了「藥石」的功效。前者明言用藥治病得失參半，並且觸及人性之常皆喜猛烈迅疾的行動，認為「收功寧使遲，覆敗不可玩」，這多少與韓在未作好妥善準備即宣誓北伐有關，而若後果為「覆敗」，就更應謹慎從事。後者明言「過劑藥傷人」外，還進而申述「人情喜一快」的論點，認為行事須學大禹之治水，因其所性、因地之宜加以疏導；之後又以「無為萬物春」作結。這指出了伐金之舉不能因物制宜的問題，蘊涵了或許不事北伐反而是更好的作法的可能，甚至是敵我兩方共存雙贏之福。值得玩味的另一點是〈小疾治藥偶書〉二首的「安得如神禹，常行無事中？」與「無為萬事春」和韓侂胄定議伐金前三年寫的〈病中作〉二首之二的「默默要無營」意趣極為近似，可見在相對承平的時代，陸游的治國主張是較為一致的。

⁵⁵ 曾棗莊、劉琳主編：《全宋文》冊 223，頁 137。

⁵⁶ 于北山：《陸游年譜》，頁 544-545。

⁵⁷ 若與寫於 76 歲（1200）的〈秦州報恩光孝禪寺最吉祥殿碑〉「天下無不可舉之事，亦無不可成之功。始以果，終以不倦，此事之所以舉，而功之所以成也。」相比，更可以看出陸游對人定勝天之態度的修正。曾棗莊、劉琳主編：《全宋文》冊 223，頁 178。

85 歲的此類詩作層次益高、格局益大、胸懷益厚。〈病起雜言〉在之前的基礎下，把疾患與災禍視為維持身體與國家健全安康的必需品，甚至可視為砥礪其更加精進的嚴師畏友。如果我們將其落實到當時的政治情勢，或許是詩人不只接受了宋金並存的事實，而且還願意用更為積極正面的態度去看待它，進而賦予其深刻的價值，認為金朝的存在無損於宋朝追求王天下的理想——「昆夷獫狁無害於周之王」，此外，舉「古來惡疾棄空谷，往往更得度世方」也表現了宋朝經過這樣的磨練或可臻於更為佳善的境界。這樣的思考，與〈幽居記今昔事十首以詩書從宿好林園無俗情為韻十首之七〉所言之「老來更事多，考古見本根，乃知當時事，禍福未易言」頗能互相呼應，好壞禍福不能只看當時的片面判斷，而應從更宏濶長遠的角度加以審視。還有，陸游面對這樣的狀況，竟如此說道：「我年九十理不長，況復三日病在牀，天公念之亦已至，儆戒不使須臾忘」，把患病（菑眚）看成是上天對自己的關懷眷顧，全無絲毫怨怪不悅之意，在詩末他又說「躋民仁壽則非職，且為老憊鍼膏肓」，切割了治國平天下的責任，也就意味著將此託付給執政者，願其能依此詩所言努力國政，不要為了艱難的處境而懷憂喪志。

同年秋日所作之〈疾小愈縱筆作短章〉焦點集中於治內，亦即歷經開禧北伐後複雜的政軍狀況，因為戰時於敵後或前線支援宋軍的忠義人之處置若不當，極易形成嚴重的社會問題，此時已有放散忠義人聚而為盜者。⁵⁸還有，在此年 5 月，韓侂胄同黨忠義軍統制羅日愿聚眾密謀刺殺史彌遠，並盡殺宰執以下官員，後因謀泄被

⁵⁸ 「忠義人」或「忠義軍」是宋室渡江後才產生的群體，一般指身在敵後、心向宋廷且願參與軍事行動以表達支持者，但也有已歸正而在南宋境內活動者。忠義人在開禧北伐中出力頗多：如開禧元年 5 月，「鎮江都統戚拱遣忠義人朱裕結弓手李全焚漣水縣」、開禧 2 年 4 月「光州忠義人孫成復褒信縣」、開禧 2 年 12 月吳曦降金，次年 2 月為楊巨源、李好義等所殺，二人並乘勢追擊，李好義「進兵，次于獨頭嶺，會忠義及民兵夾擊，金人死者蔽路。」同年 3 月「忠義統領張翼復鳳州」、4 月「四川忠義人復大散關」，以上俱可見忠義人在此中所扮演的角色。然而，伐金之舉中途生變，忠義人頓失所依，或有聚而為盜者（嘉定 2 年 10 月丁亥「命京湖制置司募逃卒及放散忠義人以補其闕，因放散人聚而為盜故也。」）遂衍生為社會問題，故此年屢見朝廷對忠義軍之安置措施：如 4 月，「放廬、濠二州忠義軍歸農」等。以上除「嘉定 2 年 10 月放散人聚而為盜」條外，俱見元·脫脫：《宋史·寧宗本紀》（臺北：洪氏出版社，1975），頁 738-753。「聚而為盜條」見清·畢沅：《續資治通鑑·南宋紀》（北京：中華書局，1979），卷 158，頁 4289。

殺。⁵⁹忠義人的特殊身分與對宋廷的認同，使得陸游特別注意處置之方式，雖然他們有時不免違法亂紀，但其處境亦有可堪哀憐之處，所以此詩提出「復常」、「撫摩有道」的原則，贊成協助他們歸於農桑，以便於脫離戰時生涯，重新回到日常的生活軌道上。他因此也對以激烈手段殲擊盜賊之作法深致不滿：「藉曰用戈矛，全之寧欲傷……奈何一朝忿，直欲事歐攘？歐攘雖快心，少忍理則長。」用「華陀古神醫，煎澆到肺腸，取效雖卓犖，去死真毫芒」為例，更發人深省，他認為華陀治病開膛剖肚，雖可得神效，然而一有差錯，則去死幾微。這個方式風險太大，傷害甚劇。其實，對照當時處置忠義人稍有不慎即成盜匪的情況，也有相當的類似性。這個比喻對人民的愛顧與決議北伐後所寫的「奔命不敢辭，所懼殘吾民」（〈養生〉）如出一轍，可以看到陸游對政治舉措的深層思考基礎。

五、結論

對照陸游以治國隱喻治疾的詩篇寫作時的政治情勢，再回頭檢視其分布的狀況，大概可以推測其背後的原因。

他以治病譬喻治國起源很早，可是直到 81 歲以後才穩定均勻的出現，這表示他在此時期對此一隱喻持續的興趣，而且由其內容可知與時勢的密切關係。

而 83 歲那一年的空闕，也許是因為這時宋金戰況撲朔迷離，韓侂胄仍主事，但主和派聲勢亦壯，本就贊成伐金的詩人衡度時勢，亦有不知如何評判之感。這個狀況在次年夏日所作的〈病戒〉寫得很清楚：「人所忽不省，我思嘗熟爛」，不久之前他才寫過「釋楚為外懼，此實計之得」，接受議和的現實應該是詩人經過長久細密的思索後方才提出的意見。而且從此以後的相關詩篇就一直針對、環繞此一主題下筆。

至於 84、85 歲相對多量的此類創作，可能揭示了詩人對和戰態度轉變的複雜心理。一生呼籲北伐恢復的愛國詩人，在晚年卻突然安於宋金並存的事實，不僅他自

⁵⁹ 「嘉定 2 年 5 月……借補訓武郎羅日愿謀為變，伏誅。」參元·脫脫：《宋史·寧宗本紀》，頁 752。

己不易適應，其他人恐怕也一時難以消受；更有甚者，面對韓侂胄等主戰人士及其最後悲慘的下場，陸游也無法在戰爭前期擁護推戴，而在之後提出嚴正的檢討並為國家規畫最為可行的走向，這就是在同期的愛國詩作數量變少的可能原因。⁶⁰

84歲那年的2月，陸游寫〈廬帥田侯生祠記〉⁶¹，詳細記述淮南節度使兼知廬州田琳抗金的事蹟，時間由南宋尚未正式宣戰前的開禧2年8月起述，此篇言田琳不但智勇兼具，攻防俱佳，實為勳力王命之典範，可惜早逝致勳業不卒。由此可知他堅持復國的主要立場，只是在面對現實時必須作出艱難的選擇。

如果這個轉變如斯難堪，為何垂垂老矣的詩人仍要不辭辛苦以疾病隱喻曲折地加以表達呢？我們知道陸游對國家的忠愛決非僅止於一意倡言戰爭而無其他真誠負責之考量者。開禧北伐的風險及其後國力的疲殆、內政的動蕩等在在都是詩人極為關切之議題，不論是為了自己的面子或是執意維持一貫的主張，對他來講都是不可為亦不願為之事。在此類詩作中他一再提到「理」的重要，如北伐之前的「一理儻造微，何事不可明」（〈病中作〉二首之二）、北伐後的「萬事有常理，中智皆能知」（〈病中有述二首各五韻〉）、「此理君能造，無為萬物春」（〈小疾治藥偶書〉二首之二）、「歐攘雖快心，少忍理則長」（〈疾小愈縱筆作短章〉），可見詩人一旦想通其中的道理，便須誠實以對，而且他也衷心以為惟有如此才能真正解決疑惑與問題。

詩歌表意的管道與形式變化萬端，藉由釐析陸游疾病隱喻中的相關論述，我們抉發了他涵藏於其間的幽微思想，也為其愛國書寫增添了一縷曲折柔和的韻味，尤其是他最後以維持生命為重，並於相對不利的情勢中長養深厚的仁愛、忠厚之心，更令人動容。也許隨著年歲的增長、身體的衰邁，壯志如虹的陸游漸漸體會到了存

⁶⁰ 朱東潤將一直以來頗具爭議性的詩人與韓侂胄之關係定調為「在一致對外的基礎上和韓侂胄接近了」，可說是相當公允的說法。見氏著：《陸游傳》（天津：百花文藝出版社，2003）第十二章標題。《宋史·陸游傳》稱「晚年再出，為韓侂胄撰〈南園〉、〈閱古泉記〉，見譏清議」，參元·脫脫：《宋史》，頁12059。但〈南園記〉的重點在期勉韓侂胄繼述其曾祖韓琦之志業，這當然包括了忠獻公撫定西夏的功績：「公之為此名，皆取于忠獻王之詩，則公之志，忠獻之志也。與忠獻同時，功名富貴略相埒者，豈無其人？今百四五十年，其後往往寂寥無聞。韓氏子孫，功足以銘彝鼎、被絃歌者，獨相踵也。逮至于公，勤勞王家，勳在社稷，復如忠獻之盛。而又謙恭抑畏，拳拳志忠獻之志，不忘如此。」曾棗莊、劉琳主編：《全宋文》冊223，頁144。

⁶¹ 曾棗莊、劉琳主編：《全宋文》冊223，頁135-137。

養的重要，也能更加深刻地了解南宋國勢的真實狀況，因此他把對治國禦戎的領會與治病養生結合起來，利用切身的生活經驗充分類比了不易啟齒的政治新主張，委婉而藝術地說出了另一種心聲，而與其愛國之音互相補充、彼此對話，呈現了誠摯豐富的內涵。

至今為止對陸游的研究幾乎眾口同聲地視陸游為至死不渝的主戰派⁶²，並以此歌頌其愛國情操，本文的研究結果或可提供閱讀其相關作品時的另一種角度。

⁶² 如于北山於開禧 3 年之按語云：「但投降者乃南宋統治集團之主和派、動搖派；人民群眾與愛國志士永遠不肯言降；代表人民吶喊之民族歌手陸游亦永遠不肯言降，在宋廷投降前後，在務觀創作中，不見一首動搖之詩篇。」參氏著：《陸游年譜》，頁 537。于氏此說與之後於頁 544-545 之說已稍有牴觸，要言之，他最多只承認再戰是「不可得為」之事，卻未注意到陸游對和議有更詳密與深入的見解。李致洙亦總結其「憂國」之思為「早年就確定驅逐敵寇收復失地的愛國思想，以後始終堅持不渝。陸游對於中原淪陷，認為這是絕不可容許的事，決心要恢復到原來的秩序體系裡。」參氏著：《陸游詩研究》（臺北：文史哲出版社，1991），頁 102-103。

引用書目

一、原典文獻

- 西晉·杜預注，唐·孔穎達疏：《十三經注疏·左傳》，臺北：藝文印書館，1983。
- 東漢·趙岐注，北宋·孫奭疏：《十三經注疏·孟子》，臺北：藝文印書館，1983。
- 戰國·墨翟著，李漁叔註譯：《墨子今註今譯》，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74。
- 漢·劉向：《說苑》，收入百部叢書集成本第147冊，臺北：藝文印書館，1965。
- 宋·陸游：《入蜀記·老學庵筆記》，上海：上海遠東出版社，1996。
- 宋·陸游著，錢仲聯校注：《劍南詩稿校注》，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5。
- 元·脫脫：《宋史》，臺北：洪氏出版社，1975。
- 明·陳邦瞻：《宋史記事本末》，臺北：三民書局，1973。
- 清·畢沅：《續資治通鑑》，北京：中華書局，1979。
- 曾棗莊、劉琳主編：《全宋文》，上海：上海辭書出版社、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2006。

二、近人論著

- 于北山：《陸游年譜》，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5。
- 王夢鷗：《文學概論》，臺北：藝文印書館，1982。
- 朱東潤：《陸游傳》，天津：百花文藝出版社，2003。
- 李致洙：《陸游詩研究》，臺北：文史哲出版社，1991。
- 東定芳：《隱喻學研究》，上海：上海外語教育出版社，2003。
- 季廣茂：《隱喻視野中的詩性傳統》，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1998。
- 林富士：《疾病的歷史》，臺北：聯經出版社，2011。
- 黃奕珍：〈陸游詩歌中「北伐」之「再現」析論〉，收入周裕鍇編：《第六屆宋代文學國際研討會論文集》，成都：巴蜀書社，2011，頁410-429。
- 黃奕珍：〈試論陸游筆下的異族形象〉，收入鄭毓瑜主編：《文學典範的建立與轉化》，臺北：臺灣學生書局，2011，頁259-296。

〔美〕雷可夫、詹森著，周世箴譯注：《我們賴以生存的譬喻》，臺北：聯經出版社，2006。

〔美〕蘇珊·桑塔格著，程巍譯：《疾病的隱喻》，上海：上海譯文出版社，2003。

Ricoeur, Paul. *The Rule of Metaphor*. London: Routledge & Kegan Paul. 1978.